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100-2410-H-343-004-
執行期間：100年08月01日至101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計畫主持人：楊仕樂

計畫參與人員：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江彥賢

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1 年 08 月 30 日

中文摘要：中國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的研究，是當今現實主義（Real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間理論爭議，與如何面對崛起中國政策辯論的交會點。依循現實主義的傳統，崛起後的中國將走向侵略擴張、破壞體系穩定；但從建構主義的觀點出發，現實主義純物質的見解則被認為是忽略了文化對行為的作用，是只基於西方經驗的片面斷言。中國與西方有著不同的戰略文化，是中國「王道」與西方「霸道」的差別，如果不考慮中國此一戰略文化的獨特性，將不能瞭解中國的戰略行為。只不過，這種「王道」與「霸道」之別的見解，往往缺乏嚴謹的實證檢驗。目前雖有研究嘗試以有系統的方式呈現宋、明兩代的歷史紀錄，視這兩個朝代為中國戰略文化解釋最可能成立的案例，來駁斥這「王道」不同於「霸道」的論點，但這樣的實證研究仍然只佔相對的少數，且亦存有概念與方法上的缺陷。中國究竟有沒有所謂的「王道」戰略文化？「王道」戰略文化對中國的戰略行為究竟有沒有影響？本研究將採取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觀點，以「王道」戰略文化解釋真正最可能成立的清代為案例，對這兩個有關中國戰略文化的焦點問題提供解答，以為當今的理論爭議與政策辯論提供參照。

中文關鍵詞：現實主義、建構主義、戰略文化、物質、理念、武力使用

英文摘要：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is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between realist and constructivist and the policy debate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rising China.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realism, a rising China will go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undermin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In contrast,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this realist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ignores the role of culture on state's behaviors and is an incomplete assertion based on Western experience only. In fact,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different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 'benevolent'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hegemony.' Only when this unique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is considered can one understand China's strategic behavior. Nonetheless, this 'benevolent/hegemony' argument often lacks rigorous empirical testing. Some attempts was made by presenting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nes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aking these two as the most likely cases for strategic culture explanation.

However, such empirical researches are relatively rare and contain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laws. Is there really a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in China? Did this Chinese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ever have an impact on China's strategic behavior? This research project intends to introduce a material basis/ideational inertia perspective on the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us takes Chinese Qing Dynasty as the real most likely case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cultural explanation. The finding will contribute to both theoretical and policy debates.

英文關鍵詞： Realism, Constructivism, Strategic Culture, Material, Ideation, Use of Force

※ 本結案報告部分內容已獲 TSSCI 期刊刊載，並投稿 SSCI 期刊審查中，敬請勿使用。

目錄

第一章 理論架構.....	3
第十二章 結論.....	14
參考文獻.....	19
附錄.....	20

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745-1860

摘要

中國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的研究，是當今現實主義（Real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間理論爭議，與如何面對崛起中國政策辯論的交會點。依循現實主義的傳統，崛起後的中國將走向侵略擴張、破壞體系穩定；但從建構主義的觀點出發，現實主義純物質的見解則被認為是忽略了文化對行為的作用，是只基於西方經驗的片面斷言。中國與西方有著不同的戰略文化，是中國「王道」與西方「霸道」的差別，如果不考慮中國此一戰略文化的獨特性，將不能瞭解中國的戰略行為。只不過，這種「王道」與「霸道」之別的見解，往往缺乏嚴謹的實證檢驗。目前雖有研究嘗試以有系統的方式呈現宋、明兩代的歷史紀錄，視這兩個朝代為中國戰略文化解釋最可能成立的案例，來駁斥這「王道」不同於「霸道」的論點，但這樣的實證研究仍然只佔相對的少數，且亦存有概念上的缺陷。中國究竟有沒有所謂的「王道」戰略文化？「王道」戰略文化對中國的戰略行為究竟有沒有影響？爲了對這兩個有關中國戰略文化的焦點問題提供解答，本書將提出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觀點，指出清代才是「王道」戰略文化解釋真正最可能成立的案例，並透過清代兩度對準噶爾、兩度對廓爾喀、一度對回部、一度對緬甸、一度對安南，以及鴉片戰爭、兩次英法聯軍等共十個案例進行探索。從此本書發現：中國的「王道」戰略文化，儘管並不算明顯，但確實是存在的；而此一「王道」戰略文化，儘管作用並不強烈，但仍確實影響了中國的戰略行為。因此，戰略文化的因素並不能全然予以否定，仍有持續研究的必要。

關鍵詞：現實主義、建構主義、戰略文化、物質、理念、武力使用

第一章 理論架構

壹、前言

中國的「崛起」，從 1990 年代以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政策上，就一直一直是國際關係學界所最為關心的課題之一。¹「崛起」後的中國將會如何行事？依照國際關係學界中現實主義（Realism）的傳統，一個興起的強權往往會走向侵略擴張，危害世界的和平穩定，在此中國也不會例外。²然而，在同一時期內，現實主義的傳統見解，也日益受到新興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風潮的挑戰，只注重相對權力起落此一外在客觀物質環境的分析，被認為是忽略了文化對國家行為的重要作用。³以中國此一主題而言，若指中國將因興起而引起衝突與戰爭，是只基於西方經驗的片面斷言，但中國與西方其實有著不同的「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簡而言之是中國「王道」與西方「霸道」的差別，如果不考慮中國此一在戰略文化的獨特性，將不能瞭解中國的戰略行為。這樣的見解，甚至也成為當今中共當局的說詞，聲稱其現行所一再標榜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必然選擇」。

只不過，這種「王道」與「霸道」之別的見解，往往只有空洞的主張，加上自由的隨機舉證，缺乏嚴謹的實證檢驗，正反見解之間常陷於各說各話，反映著戰略文化研究多年來的窠臼。⁴期間，是有研究嘗試突破這樣的缺失，以有系統的方式呈現中國歷史上的證據，以中國戰略文化解釋最可能成立的情況為案例（most likely cases），來駁斥這「王道」不同於「霸道」的論點，也確實將有關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⁵然而，這樣的實證研究仍然只佔相對的少數，且仍存有概念上的缺陷：宋、明兩代並非「王道」戰略文化真正的最可能案例。中國究竟有沒有所謂的「王道」戰略文化？「王道」戰略文化對中國的戰略行為究竟有沒有影響？為了解答這兩個圍繞中國戰略文化的焦點問題，本書嘗試

¹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 59-74.

² 目前，現實主義常被進一步分為「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與「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在此現實主義一詞是指與現實主義傳統立場相同的攻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的代表性著作與其對中國崛起的預期，可參閱：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Yuan-Kang Wang,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0, No. 1 (March 2004), pp. 173-201.

³ Michael C. Desch, "Culture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9), pp. 141-170; C. Dale Walton, "The Strategist in Context: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Thought, and the Pursuit of Timeless Truth,"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3, No. 1 (January 2004), pp. 93-99; Rashed Uz Zaman, "Strategic Culture: A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Wa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8, No. 1 (January 2009), pp. 68-88;

⁴ 對戰略文化研究的批評詳見：David M. Jones & Mike L. Smith, "Noise but No Signal: Strategy, Culture, and the Poverty of Constructiv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4, No. 6 (November 2001), pp. 486-487; 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Autumn 2002), pp. 87-113.

⁵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提出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觀點，作為未來研究的指引。如果在歷史紀錄中，就是找不到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的存在，及其對中國戰略行為影響的證據；如果「王道」戰略文化在真正最可能成立的案例上，仍無法通過實證檢驗，吾人即不再需要考慮戰略文化，而可回歸現實主義單純的物質因素解釋。

本書將分為三大部分進行。在第一章中，本書首先概略回顧迄今有關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的及其缺陷，特別是迄今最新的第四世代研究；隨後，本書則提出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第五世代觀點，據以指出清代才是「王道」戰略文化解釋真正最可能成立的案例，提出關於使用武力的四個關鍵問題，引導後續的實證研究。接下來從第二章到第十一章，則依照研究設計的指引，針對清代兩度對準噶爾、一度對回部、一度對緬甸、一度對安南、兩度對廓爾喀的戰爭，以及鴉片戰爭、兩次英法聯軍等共十個案例進行探索。最後是結論的第十二章，總結研究發現、貢獻，並指出未來研究的方向。

貳、中國戰略文化：文獻探討

一、研究的四個世代

「戰略文化」的概念，是由施奈德（Jack L. Snyder）在 1977 年針對蘇聯核子戰略的研究中所首創，其緣由一如當前對於中國戰略文化的關注。在冷戰期間，蘇聯為何好像有著與美國不同的核子戰略？在物質環境分析似乎無法提供答案之際，遂訴諸於文化的解釋。施奈德引用了人類學家克洛伯（Alfred Kroeber）與克魯洪（Clyde Kluckhohn）對「文化」的定義，將戰略文化界定為：「一國戰略社群的成員們，透過學習與模仿而獲得且彼此共有的一切觀念、受制約的情緒反應、與習慣性的行為的總和」。⁶儘管施奈德本人之後對此並未再繼續延伸，但戰略文化的研究卻十分蓬勃地擴展開來。⁷現今有關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可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江憶恩在 1995 年時就從戰略文化的意義，以及文化與行為間的關係為準，提出了戰略文化研究的三個世代，⁸作為他針對中國戰略文化進行研究的前奏，這樣的世代劃分在今天仍然十分適用。

第一世代的戰略文化研究，視戰略文化為一有關武力使用之長期累積、無所不包的概念，是一國一切理念（ideal）與行為（behavior）的總和、一種持續不

⁶ Jack L.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77), pp. 8, 16, fn8.

⁷ 戰略文化研究的另一個淵源，是 1932 年時李德哈特（Basil H. Liddell Hart）檢討了英國一次大戰的經歷之後，所提出的「英國式的戰爭方式」（British way of warfare）之說，也就是後來所謂一國從事戰爭時會有其「國家風格」（national style）的論點。不過施奈德以來的戰略文化研究鮮少與此重疊，雙方很少引用對方的著作。見：Lawrence Sondhaus,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s of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13.

⁸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32-64.

變的特徵。主張中國具有「王道」式戰略文化的見解，大多就是採取這第一世代的觀點。例如張鐵軍（Zhang Tiejun）在 2002 年的研究即認為，兩千多年來無論是從思想著述、政治言論、還是對外政策的實踐來看，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特徵，就是強調和平、防守的「文化道德主義」（culture moralism）。⁹第二世代的戰略文化研究，則視戰略文化為一象徵性的語彙符號，作用是自我正當化並將敵人妖魔化。一些反對中國具有「王道」是戰略文化的見解，多少就留露出這樣的特徵。例如史高伯（Andrew Scobell）在 2002 的研究即主張，當今中共認為自己基於中國傳統的戰略文化，是以和平、守勢為本質，而西方或日本的戰略文化，則是以暴力、擴張為本質。中共即使使用武力開戰，也是逼不得已的「自衛還擊」。¹⁰第三世代的戰略文化研究，則將戰略文化視為是基於近期經驗、相對易於改變，而且只含有理念的成分而將行為的成分剔除。許多著重於近代中共建政以來動武紀錄的中國戰略文化研究，無論是駁斥或支持中國有「王道」戰略文化的論點，都具有這第三世代的特徵。例如張曙光（Zhang Shu Guang）在 1992 年對 1949 至 1958 年美中軍事衝突的研究，¹¹史高伯在 1999 年對中共介入韓戰，以及 2003 年對中共建政以來武力使用的研究，¹²或是馮蕙雲（Feng Huiyun）2007 年對中共建政以來歷代領導人的思想分析。¹³

從江憶恩看來，這三個世代各有其優點，但也都未臻理想，不能真的澄清戰略文化與戰略行為之間的關係。第一世代的研究，顯然最接近戰略「文化」的本意，但缺乏學術研究應有的邏輯與方法上的嚴謹。既然文化是一切的總和與持續不變的特徵，則戰略文化的確切內涵不僅很難斷定，戰略文化與戰略行為之間的關係，也不免落入一切解釋一切、因果不分的套套邏輯（tautology）陷阱。第二世代的研究，則著重言行間的落差，可能切斷戰略文化與戰略行為之間的關連。戰略文化的概念，變得像是政治意識型態的宣傳工具，一方面是可能因自我催眠而影響了行為，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只是行為之外的刻意包裝，其實是言不由衷。第三世代的研究，雖然符合了邏輯與方法上的嚴謹，在以文化解釋行為時避免了套套邏輯的問題，但也使的戰略文化的概念，變得像是決策組織甚或決策者個人的認知體系，而不再像是「文化」一詞本來的意涵。同時，就算只限定較短的時間範圍，戰略文化研究可能得分析的對象仍相當龐雜，包括政治家、哲學家、戰略家、政軍領袖等的著述與言論，教範操典與武器設計，甚至對外政策、戰爭計

⁹ Zhang Tiej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 2 (April-June 2002), pp. 73-90.

¹⁰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pp. 1-39.

¹¹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¹² Andrew Scobell, "Soldiers, Statesmen,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a's 1950 Intervention in Kor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November 1999), pp. 477-497;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¹³ 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7-35.

畫等等均含括在內。¹⁴從此觀之，江憶恩自己對中國戰略文化所進行的研究，其實是開創了與前三個世代都不同的取向，或可稱之為第四代的戰略文化研究：戰略文化是長期持續、近乎固定的，必須盡可能從一國最早的歷史經驗中去尋找，但其成分只包含理念而不包括行為面向，並以此理念解釋一國所採取的戰略行為。¹⁵

二、第四世代的研究

江憶恩主張，作為理念的戰略文化包含兩個元素：「一是提供有關人類事務中衝突的本質、敵人的本質、暴力的效能等三個基本但相關問題解答的核心典範，二是邏輯上從這些核心假設所推導出的一系列戰略偏好次序。」¹⁶至於如何依循此一定義，歸結出中國戰略文化的具體內容？一改以往戰略文化研究在觀察對象選取時籠統、隨機的態度，江憶恩精確選定了戰國時代以來陸續集成的中國戰略思想著述《武經七書》，作為分析對象。江憶恩發現，儘管他所稱孔孟式的（Confucian-Mencian）「王道」觀點的確曾在《武經七書》中出現，但多只有點到為止的象徵性作用，這七部中國戰略思想經典大體上都十分肯定武力的作用，並且強調攻守的選擇必須視情況而定，也就是「權變」的原則。因此，江憶恩認為中國擁有的其實是一種權力政治（realpolitik）式的「備戰」（parabellum）戰略文化，與西方的「霸道」並無不同。¹⁷江憶恩隨後以明代（西元 1368 至 1644 年）中國對外政策為案例研究，檢驗此一中國「霸道」戰略文化對於中國戰略行為的影響，並發現兩者之間的正向關連。「霸道」肯定武力的作用與攻守之間的權變，反映在明代的對外政策，是在明朝相對較強大時較具侵略性，相對較衰弱時則較為忍讓退卻，並藉此累積實力以重新轉回攻勢政策。因此，江憶恩主張，中國的戰略行為確實是受到中國戰略文化的影響，儘管明代的對外政策是符合現實主義的論點，但卻不是物質環境的直接作用而是戰略文化的結果，江憶恩遂稱之為文化現實主義（culture realism）。¹⁸

江憶恩的研究因其精確的定義與嚴謹的操作而廣受重視，但其文化現實主義的結論一方面雖肯定了文化對行為的作用，卻在另一方面也否定了戰略文化研究的價值。畢竟，如果在繁複文本分析得出一國戰略文化的內容之後，再從此一戰略文化所導出的解釋，還是與簡明的現實主義物質環境解釋相同，則在以簡馭繁的標準下，根本不必多此一舉訴諸戰略文化的解釋。同時，江憶恩從《武經七書》汲取出中國戰略文化的作法，也引起批評。王元綱（Wang Yuan-Kang）即指出，

¹⁴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p. 4-22, 39.

¹⁵ *Ibid.*, pp. 39-40.

¹⁶ *Ibid.*, pp. 33-34.

¹⁷ *Ibid.*, pp. 27-30.

¹⁸ *Ibid.*, p. 28. 江憶恩之後的研究也認為，此一戰略文化更一直持續至中共建政之後，見：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6-268.

從官員的養成、考選、與決策權力的比重來看，就算是武官教育《武經七書》也只是一小部份而已，真正重大的決策其實還是由皇帝與科舉出身的文官所控制，他們所熟悉的是《四書》這般的儒家經典。易言之，儒家經典中透露出的「王道」理念，才是中國戰略文化的真正樣貌。¹⁹從此，王元綱以明朝與宋朝（西元 960 至 1279 年）為案例進行研究，進一步駁斥中國「王道」戰略文化解釋的有效性、肯定現實主義解釋的優越。王元綱指出，宋明兩代是中國儒家思想最鼎盛的時期，如果中國戰略文化對中國戰略行為真的具有解釋力，則「王道」戰略文化將最可能在宋、明兩代的對外政策上找到支持，如果在這兩個朝代都還找不到具體證據，幾乎就可否定戰略文化的解釋力。²⁰

王元綱從有關使用武力、發動戰爭的三個重要問題，來檢視戰略文化對戰略行為解釋的效力。其一是使用武力：在機會來臨時，是否願意主動發動戰爭？其二是權力與壓迫：當權力相對上升時，一國是否會更具侵略性？其三則是戰爭的目標：是否超過單純的邊境防衛與現狀維持，並在客觀條件許可時追求完全的勝利？²¹對此，如果戰略文化能夠解釋戰略行為，則基於中國「王道」的戰略文化，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該是否定的：中國不會主動發動戰爭，較強大的中國將會較不具侵略性，即使發動戰爭、客觀條件也允許，戰爭目標也不會超過維持現狀。經過了實證檢驗之後，王元綱發現在宋明兩代，這三個問題的答案卻全都是肯定的：中國仍然主動發動戰爭，且隨國力上升而愈加具有侵略性，也以徹底的殲滅與征服為戰爭目標，只因力有未逮才作罷。易言之，歷史證據有力地駁斥了「王道」戰略文化解釋的有效性，而全然符合現實主義的論點，說明現實主義實有超越文化差異的普遍解釋力。²²

三、第四世代研究的缺憾

儘管獲得的結論正好相對，江憶恩與王元綱對戰略文化的研究都可算是第四世代，將戰略文化視為一種長期持續的理念、不含行為的面向，同時是以思想著述為戰略文化內容的主要根據。這種方式滿足了在邏輯與方法上的嚴謹，但仍存在一個未解的關鍵爭議，那仍是圍繞著「理念」與「行為」：當行為從戰略文化中剔除之後，戰略文化還是文化嗎？²³僅只是思想著述，無論是來自《武經七書》還是《四書》，就可以代表戰略文化嗎？的確，按照江憶恩對第一世代的批評，如果文化是一切的總合，將不會有任何行為不是文化的結果：行為的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這樣的論點根本無法證明為偽（falsifiable），²⁴因此有必要將行為

¹⁹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pp. 28-31.

²⁰ *Ibid.*, pp. 9-13.

²¹ *Ibid.*, pp. 52-53.

²² *Ibid.*, pp. 262-263.

²³ 此一爭議主要是在第一世代與第三/四世代之間，第二世代的研究相對被冷落。可見：Edward Lock, "Refining Strategic Culture: Retur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3 (July 2010), pp. 685-708.

²⁴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p. 12-14.

從文化中剔除。但這在第一世代戰略文化研究學者葛雷（Colin S. Gray）看來，卻是爲了研究方法的需要而犧牲了研究對象的本質。葛雷並不否認，如果一個概念沒有確切的定義而變得無所不包，則這個概念的確不具任何解釋上的意義，但如果爲了精確界定戰略文化，而把它變成某種不再是文化的概念，這樣的作法未免是本末倒置。²⁵又如羅德明（Lowell Dittmer）更直言，江憶恩以思想著述來呈現戰略文化，根本是沒有「文化」的「戰略文化」。²⁶

可以這麼說，如果戰略文化在第一世代的研究中定義太寬，在第三世代的研究中定義太窄，則第四世代的研究以思想著述來代表戰略文化，則使得戰略文化變得一方面太過廣泛，另一方面又太過狹隘。太廣泛是指時間維度而言，思想著述在寫作完成之後可以持續存在千年之久，但在這漫漫的時間長河之中，其流傳與被接受的程度卻可能是起伏不定，如果以著述問世後固定的文字來呈現戰略文化的內容，不免誇大了這些著述的代表性。就如儒家經典著作是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但在此時只是「百家爭鳴」中的其中一家，到了漢朝才獲得獨尊的地位，而後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又受到冷落，再到宋明兩代而興盛。如此的興衰起落，適足以說明儒家經典其實不能代表中國持續的戰略文化特質。至於太狹隘則是指觀察標的而言。正因爲思想著述的流傳與接受時有起伏，就算作爲考試科目也未必真的深入人心而可以只是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唯有在文本之外再從實際對外政策的實踐來檢視，才能斷定思想著述的內容在某一段時期內是否確實瀰漫且浸透。因此，一旦觀察對象中剔除了行爲的層面，可能就把戰略文化真正關鍵的內容也一併剔除了。

簡而言之，戰略文化研究所想要呈現的因果邏輯是文化解釋行爲，故文化與行爲必須是分開的；但若行爲在本質上必須是文化的一部份，則這種分離似乎就無法允許。以王元綱的研究而言，排開了宋明兩代的對外政策，而只以科舉制度下儒家經典中的「王道」論述，呈現宋明兩代的戰略文化，其實並不是宋明兩代真正的戰略文化，如此自然也就會發現戰略文化對戰略行爲沒有解釋力。反過來說，以江憶恩的研究而言，明代中國之所以有「霸道」的戰略文化，也不是出於《武經七書》的文字，而是出於明朝的「霸道」對外政策，明代中國的戰略文化之所以解釋了明代中國的戰略行爲，是因爲兩者根本是同一件事，到頭來還是套套邏輯。²⁷ 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困境，但這不意味著第四世代所追求邏輯與方法的嚴謹其實不可取，也不意味著戰略文化的研究就只能以第一世代爲滿足。戰略文化的研究，應該要設法同時滿足邏輯與方法上的嚴謹，也不違背文化

²⁵ Colin S. Gray, "Out of the Wilderness: Prime Time for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6, No. 1 (January 2007), pp. 2-3, 13-14.

²⁶ Lowell Dittmer, "The Culture of Structural Realism,"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9, No. 1 (Winter 1997), p. 194.

²⁷ 這可說是戰略文化作爲建構主義學派一個分支的寫照。建構主義者傾向認爲，一種概念即使不可直接觀察，但若可產生可觀察的結果，仍可同意其存在。然而，若是得從戰略行爲這可觀察的結果來呈現戰略文化這個概念，再以此概念解釋戰略行爲，就成了以戰略行爲解釋戰略行爲的套套邏輯。這在建構主義者看來等於是爲了認識論而犧牲本體論，但這似乎是一種不得以的苦衷。可參閱：Alexander E.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352-353.

一詞的本意。²⁸因此，另一種不同於目前四個世代戰略文化研究的新取向，也就有必要展開了。

參、研究倡議

一、進入第五世代—物質基礎、理念慣性

鑑於第四代戰略文化研究的缺失與困境，本書嘗試提出另一種新的取向，可以稱之為第五世代，它的特性總括而言就是在物質的基礎上主張理念的「慣性」。這是來自物理學的比喻，牛頓的第一運動定律，靜者衡靜、動者衡動，以此做為第五世代研究的待驗假設，以引導後續的實證檢驗。可分述如後。

首先，第五世代與第三、第四世代一樣，都認為戰略文化的本質是理念，是戰略決策菁英們對武力使用所共同享有的集體理念，理念與行為不同，理念是原因而行為是結果。其次，理念抽象而不能直接觀察，故因理念的作用而產生的行為，才能當作被觀察的標的物：就算是思想著述也只是反映理念的行為，而不是理念的本身。那麼，哪些行為反映了戰略文化而該被觀察？第五世代主張，這不能像第四世代那般只觀察寫作著述這樣的行為，而更得觀察對外政策這樣的行為，對外政策才是戰略文化最重要、最充分的表現。意即，戰略文化可以也應該被觀察到的，就是在一段時間內持續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這樣的設想使第五世代與第一世代看來十分類似，但兩者並不相同：在第一世代中，對外政策行為模式就是戰略文化的一部份；而在第五世代中，對外政策行為模式則只是反映戰略文化的觀察對象，而不是戰略文化的本身。在此，為了避免像第一世代那般，以同一行為解釋同一行為的套套邏輯，用以呈現戰略文化內容的對外政策，與因為戰略文化而導致的對外政策，兩者在時間上必須區隔、彼此不重疊。意即，第五世代認為：前一段時間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是原因，代表戰略文化；後一段時間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則是結果，是戰略行為。²⁹

不過，之前的行為雖然是之後行為的原因，但這之前的行為自己又從何而

²⁸ 針對江憶恩的批評，葛雷認為戰略文化應該當作是瞭解行為的情境（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而不是尋求對行為的因果解釋（explanatory causality for behavior），雙方是各說各話。可見：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January 1999), pp. 49-6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trategic Cultures Revisited: Reply to Colin Gr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3 (July 1999), pp. 519-523; Stuart Poore, “What is the Context? A Reply to the Gray-Johnston Debate on Strategic Cul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2 (April 2003), pp. 279-284.

²⁹ 這種安排也處理了建構主義學派所重視的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問題。理念與行為間的關係在研究時，雖被視為是單向的理念是因、行為是果，但行為亦可能回過來塑造理念，成了彼此互為因果的雙向邏輯。不過，理念與行為的相互塑造，仍須由可觀察到的行為模式來呈現，而這樣的行為模式記錄一旦寫下，就不受之後行為的影響，研究遂仍可採取理念（之前的行為）是因、行為（之後的行為）是果的單向邏輯。可參閱：David Dessler,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Summer 1989), pp. 441-473; Jeffrey T. Checkel, “Review Article: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325-328.

來？答案則是物質環境：這些之前行為所反映的戰略文化，可說是建立在物質下層結構上的上層結構。套用建構主義代表性學者溫特（Alexander E. Wendt）的名言，文化雖然本質上是集體的理念，但並不是「理念到底」（“ideals all the way down”），³⁰物質的因素並不能一概排除。反過來說，戰略文化雖不是憑空而來、得有其特定的物質條件為基礎，³¹但也不全然是物質條件的反映、不是物質到底。當作為基礎的物質條件消失後，戰略文化未必同時消失，而可持續存在一段時間，直到新的戰略文化在新的物質條件上形成，這一段持續的時間就是理念的「慣性」（正如同煞車時車上的乘客會向前傾一般）³²。當物質的基礎改變而理念的慣性還存在時，才能真正論斷文化對行為是否有影響。易言之，就是在這個物質條件轉變的斷層上，戰略文化才可以作為獨立於物質因素之外的原因，解釋一國的戰略行為。³³

從此可以瞭解到，在第五世代的觀點下，戰略文化還是一種長期累積、持續的理念。那麼，戰略文化跨越的時間維度究竟有多久？這雖得看物質環境的變遷步調而定，但至少得是上百年、超過一般人生命的限度，如此才不會是基於個人的親身經驗。可以這麼說，第五世代的戰略文化概念，雖不會像第三世代那樣短暫只是以數十年甚至十數年計，但也很難像第一世代與第四世代那樣悠久以上千年甚至數千年計，而是介於兩者之間，大約是上百年。至於這「一段持續的時間」究竟有多久？則由後續的實證研究來檢驗。（不同世代的戰略文化概念，綜合整理如下表 1-1）

表 1-1 戰略文化的概念：五個世代

	戰略文化的		
	本質	時間維度	觀察標的

³⁰ Alexander E.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2, 112-114, 135-138, 256.

³¹ 這正如同王元綱對江憶恩的批評，江憶恩雖然從《武經七書》中主張中國有「霸道」的戰略文化，卻沒有交代此一文化究竟從何而來。不過同樣的道理，若從《四書》等儒家經典導出中國有「王道」戰略文化，也是犯了理念到底的毛病，沒有交代此一文化究竟從何而來。可參閱：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p. 26.

³² 其實，在此所提出的這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觀點，正符合戰略文化研究原創者施奈德的見解。施奈德自己並未再進一步研究，甚至還刻意避免再使用戰略文化一詞，是因為他不認同那些在他之後的第一世代戰略文化研究，把戰略文化變成一種比他原先創造時要廣泛得多的概念。施奈德認為，第一世代的戰略文化研究已將「戰略文化」擴大成「文化」了，但他自己當初之所以使用戰略文化一詞，只是指一種戰略取向在原先促成此種取向的條件消失之後，卻有了自己的生命而繼續存在的情況。可參閱：Jack L. Snyder,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 3-9.

³³ 從因果邏輯來看，戰略文化若對戰略行為有影響，可以是兩種典型。一是在物質環境許可的範圍內，指出某一個確切的行為選擇，也就是讓戰略文化擔任中介變數的地位，戰略文化的作用不違背物質條件。另一則是無視於物質環境的狀態，而直接影響行為，戰略文化的作用可以違背物質條件的作用。以此觀之，本書提出的第五世代觀點是比較接近後者，戰略文化對行為的影響可以違背物質條件，只是不能無限期地違背。可參閱：Ronen Palan, “A World of Their Making: An Evaluat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4 (October 2000), pp. 577-578.

第一世代	理念與行爲	寬，上千年	寬，一切歷史記錄
第二世代	戰略文化只是象徵性符號，未必對戰略行爲有影響*		
第三世代	理念	窄，數十年	中，當代歷史記錄
第四世代	理念	寬，上千年	窄，反映理念的傳統思想著述
第五世代	理念	中，上百年	中，反映理念的對外政策行爲模式

* 第二世代與另外四個世代的性質都不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研究時段：清代

依循第五世代的戰略文化概念，中國的戰略文化就不是兩千年來恆久不變的，而是隨著朝代更迭而有所變化，中國可以有「霸道」的戰略文化也可以有「王道」的戰略文化，兩者可能各自存在於不同的時代。從第四世代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宋、明兩代中國所擁有的，其實是「霸道」的戰略文化，那麼，中國是否曾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中，擁有過「王道」的戰略文化呢？或是說，「王道」的戰略文化，最可能存在於中國的哪一個歷史時期呢？正因為戰略文化有其物質的基礎，「王道」的戰略文所需的物質基礎就是尋找的線索。

對此，西方的經驗提供了一些啓示。其實，就算是所謂「西方」的霸道，武力擴張與壓迫也未達極致，美國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雖然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卻願意透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做出自我限制，與其盟邦透過對話與協商化解爭議、尋求共識，而不全以優勢權力強壓脅迫。³⁴這就是奈伊（Joseph S. Nye）所談的「軟權力」（soft power），意在發揮美國優越制度價值的吸引力，使美國在領導世界時能更得心應手。³⁵美國為什麼需要軟權力？因為美國具有霸權的權力地位。霸權的強大使自己可有餘裕，不必再汲汲營營，霸權的強大也削弱了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因而有利於體系內的和平與穩定，但霸權並沒有強大到可以完全依靠武力威脅與強制手段（否則就不只是霸權而是個世界政府），仍需要某種理念上的輔助力量，以促成出於欽佩、仰慕的主動、自願式服從。如今，美國也不喜歡具有負面意涵的「霸權」（hegemony）一詞，而自詡是「領袖」（leadership），³⁶這種區別正像是「霸道」與「王道」的差別，而所希望達到效

³⁴ G. John Ikenberry, "Democracy,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Restraint,"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3-238.

³⁵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軟實力」所強調這制度價值吸引力此一積極層面，不同於二次大戰後德國或日本那般，僅只是消極反對使用武力的所謂「和平主義」（pacifism）或「反軍國主義」（anti-militarism）。關於戰後德國與日本的「和平主義」與「反軍國主義」，可參閱：Thomas U. Berger, "Norms, Ident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7-345.

³⁶ Joseph S. Nye,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July/August 1995), pp. 90-102.

果也就像「王道」所強調的，是「心悅誠服」、「近悅遠來」。「王道」的戰略文化可以存在，因為它就像「軟權力」一樣，有利於霸權治理世界。³⁷

既然「王道」戰略文化需要物質上霸權地位的支撐，則現有第四世代研究以宋朝與明朝為對象就顯得不適當、反映了其所採取的理念到底態度，並非「王道」戰略文化解釋最可能成立的案例。宋明兩代雖然儒家思想鼎盛，但宋代的中國根本很難被視為是霸權，甚至也不是最強的國家，而是一個先後受到遼、金、蒙古威逼的二等強權，充其量只是兩極甚或多極中的一極。明朝就算有霸權地位也是相當的薄弱，蒙古加上後來的女真，一直是明朝揮之不去的威脅，僅明成祖在位期間（西元 1403 至 1424 年）才算對蒙古獲得相對優勢，而後不出 30 年明朝就陷入劣勢，甚至遭致皇帝被俘的慘敗。若說中國在東亞地區有毫無疑問的霸權地位，其實是在清代（西元 1644 至 1912 年）。清朝本身做為北方游牧民族加上與蒙古的親善友好，並沒有明代那般的長期外患，透過將勢力擴及新疆、青海、與西藏，清朝建立起了它在東亞的霸權地位，且此一霸權地位也非曇花一現，而在十八世紀時維持了約一百年之久。

就此而言，元朝也應該是中國歷史上另一個有毫無疑問霸權地位的時期。³⁸然而，蒙古顯然沒有按照「王道」行事，在建立起霸權地位後仍不斷地擴張、終至成為地跨歐亞的大帝國。³⁹相對的，儘管同樣是異族政權，清朝卻透過科舉制度接納了儒家思想，並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擁護，⁴⁰同時在建立起霸權地位之後，也沒有再繼續擴張。這兩相對照正顯示了，第五世代的戰略文化概念，為何是既不理念到底，也不物質到底：「王道」雖以霸權地位為基礎，但有霸權地位並不一定就奉行「王道」。易言之，光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是不夠的，還要再加上霸權的地位，「王道」戰略文化才有物質基礎。既採納儒家思想又有霸權地位的清代，才最可能孕育出「王道」的戰略文化；清代的戰略行為，才最可能受到「王道」戰略文化的影響。

三、案例選擇與研究方法：戰略決策的過程追溯

根據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第五世代觀點，整個清代需再分成兩個階段，以讓原因與結果分開。其一是清朝霸權鼎盛的時期（大約是十八世紀），也就是史上所稱的盛清時期，這應該是「王道」戰略文化的形成時期。清朝在建立霸權地位後為何沒有繼續擴張？這是否真的是「王道」的表現？在牽涉到對外武力使用的情況裡，吾人可從兩個方面來探索。一者，開戰指導。清朝建立霸權地位之後，是否主動發起戰爭？決定動武後是否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如追擊幅度、戰鬥

³⁷ 詳見：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37 卷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7-230。

³⁸ 並不像元朝或清朝一樣強大的唐朝（西元 618 至 907 年），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另一段有毫無疑問霸權地位的時光，不過唐朝的史料除了極少數之外，已經被毀。詳見：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二冊（台北：三民書局，1998），頁 187-188。

³⁹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637-642，648-654。

⁴⁰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頁 830-831。

手段)？二者，終戰指導。擁有霸權地位的清朝，在交戰中是否擴大戰爭目標？獲勝後是否嚴厲處置戰敗者？如果依據現實主義的觀點，這四個關鍵問題的答案都會是肯定的：既然清朝自認有優越的力量，就會使用這樣的力量，這正是弱肉強食的「霸道」。反之，如果「王道」的戰略文化確實存在，基於王道的和善與寬大，這些關鍵問題的答案都必須是否定的，而且還必須要有以下的證據：儘管清朝自認有優越的力量，但以力服人並不能帶來真正的順從，清朝必須展現所謂「天朝」的雍容大度，體諒、開導、教化外邦，才能使所謂的「蠻夷」心悅誠服（整理為下表 1-2）。在盛清這個階段，本書選擇了清朝霸權物質基礎最強烈的時代，也就是「王道」戰略文化的存在最可能找到證據的時代，來進行分析。這是清高宗在位期間（乾隆，西元 1736 年至 1795 年），其中史上合稱「十全武功」的對外武力使用：兩度對準噶爾、一度對回部、一度對緬甸、一度對安南、兩度對廓爾喀等共七個案例（平定天地會、兩度對金川，屬對內武力使用，故不列入），是本書的觀察對象。

表 1-2 盛清時期「王道」戰略文化是否存在的關鍵問題

霸權鼎盛時期：盛清		王道	霸道
關鍵問題			
開戰指導	主動發起戰爭？	否	是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否	是
終戰指導	交戰中擴大戰爭目標？	否	是
	獲勝後嚴厲處置戰敗者？	否	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其二則是清朝從霸權地位跌落的衰退時期，也就是史上所稱的晚清時期（大約是十九世紀前半），這應該是「王道」戰略文化理念慣性延續的時期。如同前文的討論，「王道」的邏輯是軟權力有利於霸權治理世界，在盛清時期甚至純粹出於物質解釋，也不是不能說明霸權為何要採行「王道」、為何不再繼續擴張。按照理念慣性的架構，唯有當物質基礎消失，但理念還因慣性而延續之際，物質的邏輯與理念的邏輯出現分歧，才能檢驗出戰略文化獨立的解釋效力。在牽涉到對外武力使用的情況裡，吾人也可從兩個方面來探索。一者，開戰指導。發生爭端後是否立即訴諸武力？訴諸武力後是否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如追擊幅度、戰鬥手段）？二者，終戰指導。受攻擊而挫敗後，是否增加交戰強度（如增兵）？是否不願在仍堪再戰時進入和平談判？如果依據現實主義的觀點，這四個關鍵問題的答案都會是肯定的：既然清朝自認有優越的力量，就會使用這樣的力量，這正是弱肉強食的「霸道」。反之，如果「王道」戰略文化的解釋確實成立，基於王道的和善與寬大，這些關鍵問題的答案都必須是否定的，而且還必須要有以下的證據：儘管清朝自認有優越的力量，但以力服人並不能帶來真正的順從，清朝必須展現所謂「天朝」的雍容大度，體諒、開導、教化外邦，才能使所謂的「蠻夷」心悅誠服。

夷」心悅誠服。(整理為下表 1-3) 在晚清這個階段，本書選擇了理念慣性最可能存在的時光，也就是緊接著霸權的餘暉，鴉片戰爭與兩次英法聯軍等三個案例，作為本書的觀察對象。

表 1-3 晚清時期「王道」戰略文化對戰略行為是否有影響的關鍵問題

霸權衰落時期：晚清			
關鍵問題		王道	霸道
開戰指導	發生爭端後立即訴諸武力？	否	是
	訴諸武力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否	是
終戰指導	受攻擊而挫敗後增加交戰強度？	否	是
	不願在仍堪再戰時進入和平談判？	否	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針對上述兩個時期所發生的十個武力使用案例中，清朝所呈現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可採取過程追溯 (process tracing) 的方法，依據上述關鍵問題的引導詳細檢視其戰略決策始末，以分別斷定「王道」戰略文化是否存在，「王道」戰略文化是否對戰略行為有影響。在此，本書將採取清代的原始史料作為主要的研究依據。這方面的資料相當豐富而完整，詳載了清朝帝王與重臣有關對外使用武力的討論經過，可從中擷取出所需的關鍵問題答案，以及決策過程中是否有支持「王道」的證據。

第二至第十一章 案例研究 (略)

第十二章 結論

壹、研究發現

本書站在前四個世代的基礎上，提出的第五世代的研究倡議，改進既有研究的缺失，一方面不違背戰略文化的本意，一方面滿足嚴謹研究設計的要求。據此，本書進行了後續的實證研究，針對盛清時期兩度對準噶爾、一度對回部、一度對緬甸、一度對安南、兩度對廓爾喀等七次戰爭，以及晚清時期鴉片戰爭、兩次英法聯軍等三個戰爭，總共十個案例進行探索。從中，針對本書所欲回答的兩個焦點問題：中國究竟有沒有所謂的「王道」戰略文化？「王道」戰略文化對中國的戰略行為究竟有沒有影響？本書發現了肯定的答案。

一、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確實存在

盛清時期的七個戰爭，其間四大關鍵問題的答案與史料證據的研究結果，綜合整理為下表 12-1。

表 12-1 研究發現彙整：盛清時期（■=支持「王道」的存在）

霸權鼎盛時期：盛清，第一次準噶爾戰爭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存在的證據
開戰指導	主動發起戰爭？	否	有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否	有
終戰指導	交戰中擴大戰爭目標？	否	有
	獲勝後嚴厲處置戰敗者？	否	有
霸權鼎盛時期：盛清，第二次準噶爾戰爭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存在的證據
開戰指導	主動發起戰爭？	否	有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否	有
終戰指導	交戰中擴大戰爭目標？	是	無
	獲勝後嚴厲處置戰敗者？	是	無
霸權鼎盛時期：盛清，回部戰爭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存在的證據
開戰指導	主動發起戰爭？	否	有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否	有
終戰指導	交戰中擴大戰爭目標？	否	有
	獲勝後嚴厲處置戰敗者？	否	有
霸權鼎盛時期：盛清，緬甸戰爭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存在的證據
開戰指導	主動發起戰爭？	否	有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是	無
終戰指導	交戰中擴大戰爭目標？	是	無
	獲勝後嚴厲處置戰敗者？	是	無
霸權鼎盛時期：盛清，安南戰爭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存在的證據
開戰指導	主動發起戰爭？	否	有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否	無
終戰指導	交戰中擴大戰爭目標？	否	無
	獲勝後嚴厲處置戰敗者？	否	無
霸權鼎盛時期：盛清，第一次廓爾喀戰爭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存在的證據
開戰指導	主動發起戰爭？	否	有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是	無
終戰指導	交戰中擴大戰爭目標？	否	有
	獲勝後嚴厲處置戰敗者？	否	有
霸權鼎盛時期：盛清，第二次廓爾喀戰爭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存在的證據
開戰指導	主動發起戰爭？	否	有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是	無
終戰指導	交戰中擴大戰爭目標？	是	無
	獲勝後嚴厲處置戰敗者？	否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可以發現，在七次戰爭各四個關鍵問題，總個二十八個觀察點之中，儘管並未發現全面的證據，但仍一共有多達十六個觀察點，支持「王道」的存在，而且在七個案例中的第一個關鍵問題上，證據也都支持「王道」的存在。易言之，儘管並不算非常明顯，中國的「王道」戰略文化，確實是存在的。

二、「王道」戰略文化確實有影響中國的戰略行爲

晚清時期的三個戰爭，其間四大關鍵問題的答案與史料證據的研究結果，綜合整理為下表 12-2。

表 12-2 研究發現彙整：晚清時期（ = 支持「王道」的解釋）

霸權衰落時期：晚清，鴉片戰爭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解釋的證據
開戰指導	發生爭端後立即訴諸武力？	否	有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是	無
終戰指導	序戰挫敗後增加交戰強度？	是	無
	不願在仍堪再戰時進入和平談判？	是	無
霸權衰落時期：晚清，第一次英法聯軍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解釋的證據
開戰指導	發生爭端後立即訴諸武力？	否	無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否	無
終戰指導	序戰挫敗後增加交戰強度？	否	無
	不願在仍堪再戰時進入和平談判？	是	無
霸權衰落時期：晚清，第二次英法聯軍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解釋的證據
開戰指導	發生爭端後立即訴諸武力？	否	無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否	無

終戰指導	序戰挫敗後增加交戰強度？	否	無
	不願在仍堪再戰時進入和平談判？	是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可以發現，在三次戰爭各四個關鍵問題總共十二個觀察點之中，儘管只有鴉片戰爭的第一個關鍵問題這一個觀察點支持「王道」的解釋，但就是在鴉片戰爭在這緊接著盛清時期霸權餘暉的時間點上，理念的作用被觀察到了：在這第一個關鍵問題上清朝的作法，是延續了在盛清時期的七次戰爭的模式，清朝在鴉片戰爭開始前的行爲，就是「王道」戰略文化作用的結果。易言之，儘管作用並不強烈，但「王道」戰略文化確實影響了中國的戰略行爲。

貳、研究貢獻

本書採取了最可能案例的研究設計，原意是企圖徹底駁斥「王道」戰略文化的論點，但從以上的研究發現可以看出，史料證據並沒有讓「王道」戰略文化一槍斃命，反而肯定了「王道」戰略文化的存在，也肯定了理念的慣性作用，確實可在促成「王道」戰略文化的物質基礎消失後，繼續影響戰略行爲。這樣的研究發現，顯示關於「王道」戰略文化，還有後續研究的必要。這儘管是一個暫時的、開放的答案，但仍在理論與政策兩方面產生了貢獻。

在理論層面，本書的研究發現，爲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兩方的論戰，提供了判斷：現實主義雖不能宣稱完全的勝利，但佔居上風。不似現實主義的觀點，戰略文化並不能全然予以否定，光是物質因素並不能充分解釋國家的行爲，特別是在物質條件變化的斷裂點上。從盛清時代的七次戰爭可以看出，清朝確實在這七個它可以取勝的戰爭中自我克制，忍讓、寬大、合情合理地處理對外關係，而沒有自恃武力、爲所欲爲，呈現出不同於「霸道」的「王道」。不過，建構主義的觀點卻更需保留。「王道」戰略文化確實是存在、確實是影響了戰略行爲，但既不明顯也不強烈：清代已是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的最可能案例，但就是在盛清時期仍有二十八分之十二的觀察點不支持「王道」的存在，在晚清時代中更有十二分之十一的觀察點不支持「王道」的解釋。

如同在盛清時代的七次戰爭所顯示，清朝最初採取的「王道」作法，往往都不能帶來正面回饋，清朝最後還是得施展武力；而清朝在接下來之所以沒有擴大戰爭，大多也是因爲認爲繼續戰爭會得不償失，「王道」就算存在也只是粉飾。換言之，除了在實力優勢非常充足時，「王道」都不免是一相情願：在對準噶爾與回部的戰爭中，這裡是新疆的大草原，也是清朝武力能夠充分施展之地，「王道」獲得了十二分之十的支持；但到了偏遠崎嶇的緬甸、安南、與廓爾喀，「王道」就只獲得了十六分之六的支持。從此似乎也就更加說明了，一種有建構主義修飾的現實主義，可能是比較合適的：戰略文化雖然既不是物質到底也不是理念到底，但物質的成分似乎還是比較多一些。

至於在政策層面，本書的研究發現則對如何面對目前崛起中的中國，提供了指引：面對於中共當局所聲稱的「和平發展」道路，雖不能全然相信但也不必全然駁斥。畢竟，用第五世代的戰略文化觀點來看，「王道」得有其霸權的物質基礎，當今中共用「和平發展」一詞承接「王道」的概念，何嘗不是中國霸權地位在望之下的產物，也是物質基礎使然。只是，正因為戰略文化是既不理念到底也不物質到底，物質的因素雖然佔比較大的成分，仍不足提供肯定的答案。「王道」是基於霸權，但霸權未必行「王道」；同理，「和平發展」是基於霸權，但霸權未必會「和平發展」。面對中國的崛起，究竟不能就單純從現實主義的物質觀點導出因應的政策，還是得觀察理念那較弱但不可忽視的作用。

參、未來展望

其實，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第五世代戰略文化概念，從一開始就隱含了物質為主、理念為輔的假定。這正如同本書在第一章所述，戰略文化對行為的影響可一時，但不能無限期違背物質條件：新的物質條件只要維持得夠久，或早或晚終究會創造出新的新的戰略文化。然而，這「或早」「或晚」，正是在未來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第五世代的概念，假設戰略文化的時間維度至少是上百年，而本書的研究發現也肯定了此一假設：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的時間維度確實上百年，從十八世紀中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中。然而，「至少」是上百年，「最多」又是多少年呢？兩百年？三百年？本書完成的研究尚無法回答。

如同物理學上所談的「慣性」，在不受外力作用的情況下，靜者恆靜、動者恆動，一運動中的物體即使受到阻力而開始「減速」也不會立刻完全「靜止」。同樣的道理，已經在盛清時代形成的「王道」戰略文化，儘管接下來受到晚清時代霸權衰退的衝擊，也僅是先鬆動而不會立刻完全消失。只是，鴉片戰爭後兩次英法聯軍之役中，沒有發現「王道」戰略文化作用的證據，這究竟仍算是一時的「減速」？或已是完全的「靜止」？理念的慣性雖然確實存在，但究竟能存在多久？如今，距離十九世紀又再過了一百多年，影響中國往後戰略行為的戰略文化，究竟仍是十八至十九世紀「王道」戰略文化的延伸？抑或是十九到二十世紀這另一物質條件階段所產生不同戰略文化的延伸？

這樣的疑問使往後的研究，需要在晚清期間繼續往後考察，並向民國時期移動。在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後，清朝繼續受外力的侵擾終至滅亡，而後民國建立更是陷入不斷的內憂與外患。在這一段長期衰弱的物質條件衝擊之下，「王道」戰略文化的理念慣性究竟有沒有繼續存在？在此，至少存在著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理念慣性很快就消失。若如此，物質因素有較大作用的現實主義觀點會繼續獲得肯定，但建構主義所觀察的理念作用，卻會成為崛起後中國不安分的因子。正如同「王道」戰略文化是從霸權地位這樣的物質條件上生成，與之相對應的「霸道」又何嘗不是種戰略文化？又何嘗不是從另一種物質條件上生成？中國在衰弱時光中飽受欺凌與壓迫，從晚清、民國、一直延續到中共，這種長期的物質條件

所會孕育出戰略文化，就會是「霸道」的戰略文化，而此一戰略文化也會有其短暫的慣性。易言之，當中國日後重拾霸權地位，一時之間還是會按照它在以往衰弱時期所形成的「霸道」戰略文化來行動，隨後才會有「王道」的重生。

第二種可能，理念慣性繼續存在。若如此，建構主義所觀察理念的作用，就會比目前所見的要更大，而且還需要繼續探究。「王道」戰略文化在中國衰弱之際，若仍一直從晚清延伸至民國，是否還繼續延伸至中共政權？中共究竟是真的「批孔揚秦」與舊時代劃清界線？抑或仍是不自覺地沈浸在已形成的戰略文化之中，繼續呈現沿襲自民國的「王道」慣性？在這個方向上，至少在中國這個案例上，理念的作用也許會被證明有著與物質同樣的重要性，甚至是更大的重要性：就算物質因素終究會壓倒理念因素，但在這「最終時刻」來臨前，戰略文化這樣的理念，反而才是決定中國戰略行爲的主要因素。

參考文獻

一、中文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二冊（台北：三民書局，1998）。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7~230。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二、英文

Desch, Michael C., "Culture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9), pp. 141~170.

Dessler, David,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Summer 1989), pp. 441~473.

Dittmer, Lowell, "The Culture of Structural Realism,"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9, No. 1 (Winter 1997), p. 194.

Feng, Huiy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7).

Gray, Colin S., "Out of the Wilderness: Prime Time for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6, No. 1 (January 2007), pp. 1~20.

Gray, Colin S.,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January 1999), pp. 49~69.

Ikenberry, G. John, "Democracy,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Restraint,"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3~238.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6~268.

Johnston, Alastair Iain, "Strategic Cultures Revisited: Reply to Colin Gr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3 (July 1999), pp. 519~523.

Johnston, Alastair Iai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32~64.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Jones, David M., & Mike L. Smith, "Noise but No Signal: Strategy, Culture, and the Poverty of Constructiv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4, No. 6 (November 2001), pp. 485~495.
- Kristof, Nicholas D.,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 59~74.
- Lantis, Jeffrey 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Autumn 2002), pp. 87~113.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 Nye, Joseph S.,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July/August 1995), pp. 90~102.
- Nye, Joseph S.,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alan, Ronen, "A World of Their Making: An Evaluat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4 (October 2000), pp. 575~598.
- Scobell, Andrew,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 Scobell, Andrew, "Soldiers, Statesmen,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a's 1950 Intervention in Kor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November 1999), pp. 477~497.
- Scobell, Andrew,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nyder, Jack L.,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77).
- Snyder, Jack L.,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 3~9.
- Sondhaus, Lawrence,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s of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Wang, Yuan-Kang,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0, No. 1 (March 2004), pp. 173~201.
- Wang, Yuan-K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 Wendt, Alexander E.,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335~370.
- Wendt, Alexander E.,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Zhang, Shu Gu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Zhang, Tiej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 2 (April/June 2002), pp. 73~90.

附錄

研究成果論文已刊出

楊仕樂 (2011), 「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838~1842」, 中國大陸研究(TSSCI), 54: 4, 1-27。

研究成果論文審查中

Yang, Shih-yueh, "The Study of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owards the Fifth Gene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SCI), under review.

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已發表

Yang, Shih-yueh, "Empirical Assessments of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he Case Study of Opium War," *2011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aipei: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1/11/12.

Yang, Shih-yueh, "The Study of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owards the Fifth Generation," *2011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Taichu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2011/10/16.

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稿已完成

楊仕樂,「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856-1860」, 已投稿 2012 年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年會暨研討會獲得接受。

楊仕樂,「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745-1759」, 已投稿 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研討會。

楊仕樂,「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766-1789」, 已投稿 2012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研討會。

楊仕樂,「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788-1792」, 預計投稿 2012 年中國研究年會研討會。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2/08/16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計畫主持人: 楊仕樂
	計畫編號: 100-2410-H-343-004- 學門領域: 國際關係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楊仕樂		計畫編號：100-2410-H-343-004-						
計畫名稱：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1	100%	篇	TSSCI 論文一篇已發表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2	6	100%		兩篇會議論文已發表，另四篇已撰寫完成，將於 2012 年下半年陸續投稿發表。	
		專書	0	1	100%		專書一本初稿完成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1	1	100%		在資料蒐集、資料整理、邏輯思考、與學術論文撰寫等方面，獲得訓練。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1	100%	篇	SSCI 論文一篇審查中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參與外交部研討會發表論文，提供政策建議。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TSSCI 期刊論文一篇已刊出，SSCI 論文一篇審查中，

另已發表兩篇研討會論文，並完成另外四篇研討會論文，

將共同構成本專書的初稿。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計畫，在一年內如期完成盛清時期七個案例與晚清時期三個案例對外使用武力的重大決策過程追溯，從中針對研究所欲回答的兩個焦點問題：中國究竟有沒有所謂的「王道」戰略文化？「王道」戰略文化對中國的戰略行為究竟有沒有影響？發現了肯定的答案。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確實存在，理念也確實有慣性作用，可在促成「王道」戰略文化的物質基礎消失後，繼續影響戰略行為。這樣的研究發現顯示，現實主義的純物質解釋雖然是基礎但並不完整，理念因素並不可忽視。理念的慣性究竟能維持多久，仍有待後續研究驗證。